

目 录

摇摇	前摇言	摇	员
摇摇	导摇言	摇	员
摇摇	第一部分	历史与自然	猿
摇摇	第一章	文化、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源
摇摇摇	● 导言摇		源
摇摇摇	● 生产力、生产关系摇		缘
摇摇摇	● 协作摇		源
摇摇摇	● 协作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摇		远
摇摇摇	● 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摇		远
摇摇摇	● 自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摇		猿
摇摇摇	● 自然、社会劳动、文化摇		猿
摇摇	第二章	什么是环境史以及环境史何以存在？	愿
摇摇摇	● 导言摇		愿
摇摇摇	● 什么是环境史？摇		愿

摇摇摇	● 历史的历史性摇	怨缘
摇摇摇	● 不平衡的及联合的发展摇	员猿
摇摇摇	● 结论摇	员园
摇摇	第三章 审视蒙特利湾的生态史及文化景观的三种方法	员怨
摇摇摇	● 导论摇	员怨
摇摇摇	● 自然造就文化？摇	员园
摇摇摇	● 文化造就自然？摇	员远
摇摇摇	● 作为中介的资本与阶级摇	员园
摇摇摇	● 地区性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中的异常性摇	员猿
摇摇摇	● 自然与资本的逻辑摇	员员
摇摇摇	● 结论摇	员愿
摇摇	第四章 弗尔河流域 (加州, 沸尔顿) 建筑物的特点以及对自然界的建构情况 (员愿远年 ~ 员愿远年) : 一个手稿	
摇摇摇	● 导论摇	员愿
摇摇摇	● 历史背景摇	员愿
摇摇摇	● 进入弗尔河的入口处摇	员员
摇摇摇	● 劳动过程摇	员园
摇摇摇	● 对河流的修复摇	员远
摇摇摇	● 石灰和木材的生态影响摇	员愿
摇摇摇	● 阐释摇	员员
摇摇	第五章 两个城市的故事：芝加哥和洛杉矶	员猿
摇摇摇	● 芝加哥摇	员猿
摇摇摇	● 洛杉矶摇	员苑

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与自然	猿
第六章	对“生态危机”的一些考察	源
第七章	生产的条件与条件的生产	恩
● 导言		恩
● 生产条件与国家		缘
● 生产条件与市民社会		猿
第八章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猿
● 导言		猿
● 两种类型的危机理论		苑
●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		园
●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危机依赖性制度的资本主义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的阐释		园
● 走向一种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		源
● 走向对充满危机的、具有危机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向社会主义转型的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		恩
● 有关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的附录		园
第九章	资本主义积累与经济和生态的危机	缘
● 资本主义积累		缘
● 资本主义积累与生态危机		恩
● 经济的及生态的危机		园

	摇摇摇 ● 结论摇	圆缘
摇摇	第十章 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与生态危机	猿园
	摇摇摇 ● 导言摇	猿园
	摇摇摇 ● 不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摇	猿员
	摇摇摇 ● 不平衡发展与污染摇	猿远
	摇摇摇 ● 不平衡发展与资源的耗尽 辘竭摇	猿愿
	摇摇摇 ● 联合的发展：污染与资源的衰竭摇	猿缘
	摇摇摇 ● 结论摇	猿苑
摇摇	第十一章 技术与生态学	猿园
摇摇	第十二章 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 对海湾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猿愿
摇摇	第十三章 英国在谢德兰群岛的统治	猿园
摇摇	第十四章 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猿源
	摇摇摇 ● 导论摇	猿源
	摇摇摇 ● 环境政策及可持续性话语摇	猿愿
	摇摇摇 ● 需求危机：扩张与消费摇	猿园
	摇摇摇 ● 成本危机：生产条件摇	猿苑
	摇摇摇 ● 应对成本危机摇	猿猿
	摇摇摇 ● 一轮普遍经济萧条的生态效应摇	猿缘
	摇摇摇 ● 南部国家的条件摇	猿苑
	摇摇摇 ● 政治可能性摇	猿熙
摇摇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与自然	源缘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与生态学	源
第十六章	一种激进的绿色政治学存在于美国吗？	源
第十七章	平地政治学	源
第十八章	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 走向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	源
第十九章	生态运动与国家	源
第二十章	新全球化经济以及一种替代性方案	源
第二十一章	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缘
	● 导论	缘
	● 使用价值 具体劳动—交换价值 抽象劳动	缘
	● 定量斗争 定性斗争	缘
	● 什么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缘
	● 附录一 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 比较和对照	缘
	● 附录二 生态学社会主义与生产性正义	缘
索引		缘

前言

摇摇《自然的理由》一书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历史与自然”，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作出阐述。我一方面试图绕开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混乱观点混淆在一起。与此同时，我还试图使在这些论文中所发展出的方法，比统治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统治着（在社会科学内部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分工的那些方法论观点更具全面性和实践性。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与自然”，通过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及波兰尼的社会理论的视角，对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完整性”之间的矛盾作出研究。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通过危机而进行的积累以及技术、能源、空间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对资本在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把自然界既当作水龙头又当作污水池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自然界是在下列意义上成为一个水龙头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以及再生产的资料 and 对象[譬如，所有的人类物质产品]都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地球

员

上获得的。自然界在下列意义上是一个污水池：从根本上说，所有的人类产品，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那些不受欢迎的副产品，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回归地球，根据熵的原理，即使是能源也不例外。）我把波兰尼有关“虚拟的”土地商品和劳动力商品的理论，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之中。纵观整个第二部分，我在重点关注事物的交换价值的同时，对事物的使用价值的维度也做了重点研究，譬如，在关注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的同时，也关注了工人所遭受的生物学维度上的剥削。在关注马克思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的、后来又由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充分阐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经济障碍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积累所面临的外在性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与自然”，旨在以在第二部分中已经揭示出的资本的矛盾理论为基础，对一般层面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具体层面的环境生态运动作出理论上的阐述。我尤其对那些对世界经济危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矛盾，以及那些有可能造成激进的政治可能性或者说有可能造成“激进的绿色主义”的政治可能性的社会运动感兴趣。

对本书的主要前提作一个简短的说明，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有益的。我一直以为，今天的这些激进的绿色（和绿色的激进）运动，可以说根源于一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根据来自这个国家的 100 多位科学家（包括仍然健在的 10 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 10 位科学家）在一九八〇年发出的一份警告，“人类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一方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中，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理性的预计；另一方面，在上述同一时期内，过去的那种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性的规范形式，

在那些渴望参与新全球经济的分赃（以及使当地经济避免遭受投资冷淡、资本外逃和其他各种打击）的新自由派政府（和社区）的手里，已经部分地或者说全部地被解除了。就在国家（和社会）需要对资本作出更为严格和更为理性的规范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可生存性、社区的聚合性社会功能以及作为社会稳定性之基础的社会规范的时候——国家所具有的驾驭能力（以及社会的规范能力）却变得越来越受到威胁和失去作用。尽管很多非常重要的生态和社会问题正在以更为强有力的方式凸显出来，但过去的那些规范和约束形式已经被“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和“民主”（“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所取代。总之，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经济和地理的维度上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不同类型的事件对发生在其他地点的其他类型的事件的影响，变得更快和更具决定性——而政治及社会性的规范力却变得更为简单（和笨拙）了。

一种政治上的真空（我相信确实如此）已经在各种类型的人民党主义（左的、右的、中间的、种族主义的等等）以及地方主义的政治观点蜂拥而至的地方出现了。所有能够被想出来的地方管理模式及行为模式，都被用来应付各种类型的社会生态性和生态社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有的是地区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国际性的——有些则是系统性的。当然，在这种真空中也已经出现了新型的激进的绿色和绿色的激进的政治观点，正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政治观点对全球资本霸权自由主义以及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主义都作了批判。这是一条很好的消息。

前面提到的那种基本矛盾（如果它确实如此的话）的出现，源自于 20 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时间中所发生的三种主要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变化。

第一种变化是在 20 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时间内所出现的那些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的失败：首先是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削弱；其次是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巨大推动下）的变化；再次是南部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模式的瓦解与消亡。

第二种重要的变化与上述第一种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它就是资本的地区化和全球化，以及作为资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孪生兄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轮廓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它们对人类社会、社区以及自然界的健康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数以千万计的人所认识到）。这些轮廓（或者说方面）包括：地区性及全球性的市场对国家经济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这些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出口（和进口）；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工业的私人化以及失范化；受全球资本控制或强有力影响的国际性机构对民族—国家权力的局部性霸占；各种类型的不平等的不断加大以及社会的边缘化现象。

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三种“古典性”管理模式的瓦解，以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成倍增加，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第三种、同时（从地球的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结构性变化的基础。这种变化就是众所周知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和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向那些至今尚被贬低或被忽视的生活领域的扩展（为绿色地带、生态多样性、有毒废弃物的清除等等而进行的斗争）。

总之，上述这些具有辩证性的发展过程，已经削弱了民族

资本主义的利益以及具体国家的劳动力水平。它们加快了一种国际性的统治阶级的发展以及催生出了一国际性的政治精英及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它们成倍地增加了全球性的社会和环境生态问题,同时也促进了一种新的劳动力的国际化,以及环境主义和生态学、女权主义、城市运动和(最后一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人权运动的发展(与其他类型的运动组合在一起)。它们使那些曾经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和环境生态管理的民族国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和部分地丧失反抗的能力,而此时,对于地球这个星球以及居住在上面的人们来说,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希望不是最不重要的),它们导致了一些有关社会及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生态学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员

摇摇何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生态的或者其他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在今日还有何用武之处？我的回答，如果套用黑格尔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那就是，“密纳发的猫头鹰”“在天亮的时候却折起了它的翅膀”。这就是说，当世界经济真正凸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模式（不仅仅是这种模式）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被当作一种有致命缺陷的理论、一次失败的思想努力、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那种并非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那样的东西而遭到拒斥。这是一个婴儿与洗澡水的陈旧话题，就好比因为一些教皇给恶毒和残忍的宗教法庭授予了圣权，来反对他们所指认的天主教會的敌人，就对基督教进行全面的拒斥一样（至于拒斥有组织的宗教则还涉及其他原因）。在思想开放的怀疑论者认可存在（或能够存在）一种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可信度首先应该被建立起来。

员

与自二战以来的其他任何时期相比,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更容易得到完成。尽管资本流通(尤其是生产性流通和金融)的全球化以及通信领域内的革命不仅在人类行为,而且在商业领域内,创造出了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所难以想像的可能性,但事实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都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说,情况就不是如此了,这本书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说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但不具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来说,情况就不是如此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之处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的指认,其首要和主要的含义是指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劳动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全球劳工的生活水平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近一二个世纪内,这种劳动者与国家之间的争斗对劳工来说是很难获胜的,这是当今所有的身份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都无法掩盖的一个事实。同时,全民福利国家(不管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正受到抨击,这也不再是什么秘密。今天,过度资本主义化的世界经济和被马克思称之为通过危机来完成的全球资本积累,已经使资本对劳动者的压榨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统治阶级来说,成了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劳动者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有效的反击方法,这说明,劳动者用来抵制全球资本权力(和诸如跨国银行、跨国公司这样的资本组织形式)的、有效的组织形式、策略和方法还没有被找到和付诸实施。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他肯定会预言,总有一天,世界性的工人以及一定的社会阶级结构会被建构出来用以解决上述这种状况。目前正渐成气候的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一些由美国(一个至今仍在环境、妇女、教

育、福利、住房和城市服务领域制造麻烦的世界性国家)所操纵的全球资本机构的国际范围内的抵抗,可以被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些早期例证。

这样说并不是想弱化摆在劳工和其他普通民众阶层面前的种种困难,这种困难是很大的,并且有时表现得很明显,有时却显得较为微妙和琐碎。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中,这种困难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得到了揭示。对于想构建组织化、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整体的劳动者来说,第一个困难是贫富两极的极端分化,第二个是越来越复杂化和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农民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全球性的储备劳动力的急增,也是这种困难之一。另外,资本的集中化和集约化速度的加快,国际帝国主义(新重商主义)之间的竞争的复活,金融资本不断增加的霸权和金融投机的公开化也都属于这一类的困难。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与资本之间的深刻矛盾除了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外,更多地表现在日趋多重化和交叉化的财政金融危机和政治文化危机上。当然,也像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确也有一套强有力的且行之有效的经济机制,使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正在不断地降低。

与其他人相比,那些意识到上述复杂事态的人对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姻持更多的怀疑态度。直到今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除了被看成是两个相对的或相互拒斥的概念之外,还很少被有机地联系起来。一位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说,“生态学者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不喜欢自然界”^⑤。其他批评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学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及其审视角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样的指控是欠公平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关于社会的观点

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想。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有人说,马克思的思想中缺乏对自然界之相联性、差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关注,这种指控也只是对了一半。一方面,马克思十分关注把总体上的劳动力生产过程和具体的商品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态规则性”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对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生态问题,如农业中土地的质量和数量问题(允·利比格对此作过著名的调查)的讨论也十分感兴趣。当然,这里也必须承认,马克思感兴趣的

主要是生态理性农业的条件,譬如说,怎样增加土地的肥力,以恢复和增加农业生产能力以面对由不断加快的都市化进程而带来的对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的急剧扩大的需求。

绿党中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宣称,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连下面这种明显的事实都敢否定,即自然界(与人类劳动结合在一起)是物质财富之源。马克思会说,自然界(与劳动一起)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来源。不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来源。资本家只把自然界视为“自由商品”而不充分估量它对人类的慷慨赠予。这一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自然界并没有被当成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生产力来看待。

我们的批评家可能会补充道:难道马克思没有对马尔萨斯以及自然稀缺性理论进行猛烈的攻击,并且对曾奉劝恩格斯根据能量的流变和转型来重构价值理论的普多林斯基的观点视而不见吗?难道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把“生产